

清风岭的石头是有记忆的。

这座横亘在辽西朝阳南部的山岭,峰峦如聚、清泉似练,本是省级风景区里寻常的一抹青绿,但当目光掠过那些被岁月啃噬的岩壁,触摸到“中国地”三个深嵌石中的刻痕时,所有自然景观都成了历史的注脚——这里藏着东北大地14年沦陷史中,唯一不曾褪色的中国红。

我来清风岭,专为寻访这片倔强的土地。

何为“中国地”?

当年日寇侵占东北14年,但有一块土地始终没有沦陷,被后人称为“中国地”,这个地方就在清风岭。十多年前,电视连续剧《中国地》就是根据这段真实的历史改编的,剧中主角抗日传奇人物赵老嘎,历史上确有其人,真名叫王文福,被人们称为王老凿。“老凿”是辽西方言,意指倔、犟、一根筋。伪满时期,王文福带领群众与日伪军对抗了14年,从而保留了东北仅存的、没有沦陷的“中国地”……

仁立在当年《中国地》剧组留下的外景拍摄地前,目之所及,似有一串被岁月摩挲得温热的珠子,串起了银幕内外的记忆。

顺着石板路往岭上走,最先看见的是那座炮楼。砖石垒砌的墙面上,还留着刻意做旧的弹痕,像一道道凝固的伤疤。炮楼的瞭望口朝着山谷,风从那里穿过去,呜呜地响,恍惚间能听见当年剧组里道具枪的脆响,混着演员们的呐喊,在山谷里打了个转,沉进了脚下的泥土里。墙根处长着几丛野菊,黄灿灿的,把炮楼的冷峻衬得有了几分烟火气——就像当年王老凿们守着的岭,再肃杀,也藏着人间的暖。

往深处走,是几排老乡家的土坯房。

茅草屋顶被风吹得有些歪斜,木格窗上糊着的纸早已褪了色,露出里面斑驳的木棧。推门进去,吱呀一声,像惊动了屋里的光阴。土炕上还摆着粗布被褥,墙上挂着褪色的玉米棒子和红辣椒串,灶台上的铁锅蒙着层薄灰,仿佛前一刻还有人在这里生火做饭,柴烟的味道刚顺着烟囱飘走。阳光从窗棂里漏进来,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,落在墙角的陶罐上,罐口结着细密的蛛网,网住了微尘,也网住了拍戏时留下的热乎气。

路边的碾盘还在,石碾子上的纹路被磨得光滑,边缘却依旧锋利,像还能碾得出当年的谷香。旁边的老槐树浓荫如盖,树身上系着红绸带,是后来游人系上的,风一吹,绸带飘起来,倒是树在轻轻摇晃,把那些镜头里的故事,摇成了叶子间的絮语。

走在这里,指尖划过土坯墙的颗粒,摸到的是道具师傅的匠心,更是历史的质感。那些炮楼、土房、碾盘,本是剧组搭建的布景,可站在清风岭的风里,它们就活了过来,不再只是镜头里的背景,而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——桥的那头,是王老凿们用血肉守护的“中国地”;桥的这头,是我们踮脚张望的眼神,能从斑驳的墙影里,看见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。

风穿过整个基地,带着山野的清冽。远处的山梁依旧沉默,却像在轻轻颌首,把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,记录成岭上永恒的风景。

电视剧《中国地》中的赵老嘎,是艺术加工后的人物,他的形象融入了众多辽西抗日英雄的故事。

而生活原型王老凿却是真实存在的,他不是披甲的将军,只是清风岭上一个把根扎进谷缝里的庄稼汉。他的枪或许锈迹斑斑,他的队伍或许只是些扛着锄头的乡亲,但当他们站在岭头,对着漫山遍野的石头喊“这是咱中国人的地”时,那声音里裹着的,是这片土地最原始的力量。你看那岭上的树,哪怕石缝里只有一抔土,也要把枝干挺向天空;你看那山涧的水,哪怕遇到千重岩,也要绕着弯往前奔——这便是土地教给人的道理:守得住根,就熬得过寒冬。

在清风岭,我和乡亲们聊着王老凿的故事,这位抗日时期的传奇人物,一直活在人们交口称赞的乡土语言里。

老人们说,王老凿不是啥大人物,就是土生土长的清风岭人,脸膛黑红,手上全是老茧,说话像扔石头,砸在地上能弹起来。可就是这个普通的庄稼汉,在日本人的铁蹄踏进辽西那年,把家里的几杆猎枪往石台上一墩,对着岭上的乡亲们说:“清风岭的石头是咱的,树是咱的,命也是咱的。小鬼子想上来,先问问这山答应不。”

传闻里,他的眼睛像鹰,能在黑夜里看清山路上的动静。有一回,十几个日本兵想偷偷摸进岭,刚到山脚下的“一线天”,就被他带着人堵了个正着。石头从山上滚下来,像打雷,土炮“轰”地一响,烟一散,岭还是那道岭,只是山脚下多了几具侵略者的尸体。从那以后,日本人知道清风岭有个王老凿,像块硬骨头,啃不动,还硌牙。

随我一同来访的一位县中学历史教师说,王老凿护着的不只是岭,更是“家”。那几年,周围的村子遭了殃,房屋被烧、粮食被抢,只有清风岭,像个铁打的金堡。他让人在山坳里藏了粮食,在石岩后挖了地窖,谁家有难处,他背着枪也会送过去。有个姓赵的老汉,孩子被抓了壮丁,老伴儿哭瞎了眼,是王老凿夜里摸上山,从鬼子的据点里把人抢了回来,自己胳膊上挨了一枪,血把粗布褂子都浸透了。

“中国地”这三个字,就是那时候喊出来的,不是官府封的,是岭上岭下的人一传十、十传百叫开的。他们说,别处可能成了日本人的地盘,可清风岭,有王老凿在,就是咱中国人自己的地。地里长的谷子是中国,的,岭上飞的鸟是中国的,连风都是中国的风,吹得硬气,吹得有血性。

当然,说起他的本领,老百姓的描述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夸张,什么一手好枪法,百步穿杨、飞檐走壁。其实,我早已在朝阳市委党史办里查到了关于王老凿的历史资料。

九一八事变后,在朝阳县南部组织民众抗日武装的王老凿已经58岁了,那时候这个地方还不叫清风岭,而是叫石明信沟。王老凿依托着这里山势险要、易守难攻的特点,与日伪政权抗衡,坚决不投降。

对这样一个“不合作”的反抗者,日本人所有的利诱收买均告失败,于是血腥镇压开始了。

一次残酷的血洗石明信沟的“围剿”,发生在1934年12月17日,日伪军出动了一千多人,在这里进行了整整六天的“搜剿”,共有34名群众惨遭杀害,韩枝子、孟枝子、西南沟等三个自然村的200多间房子全部被烧光,所有财物被抢。

日伪军撤走后,王老凿立即带领群众回到沟里,重建家园,拒不降敌。

1938年11月26日,30多个日寇又分乘两辆汽车突然闯进石明信沟。这时,沟里群众正在秋收,王老凿闻讯后,带队跑到山头上,一看来的鬼子不多,便开枪反击,当场打死了两个日本鬼子,与日寇激战到下午。后来日寇干脆不打了,他们在石明信沟外重兵封堵,封锁了所有出山的路,要将王老凿所部活活困死。

但让日寇没想到的是,王老凿在当地有广泛的群众基础,在封山的伪军里,也有不少是他的熟人,这些人经常暗中为他提供方便,于是封山计划又告失败。王老凿就这样,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,与日寇拉锯了整整14年,直到抗日战争结束,日寇也没能攻下石明信沟一带,这方圆十几里的弹丸之地,也是整个东北在抗战期间仅存的一块“中国地”,堪称奇迹。

走在清风岭的山路上,我在想,“中国地”到底是什么?

是那片没被鬼子占去的山梁吗?是王老凿们用过的土炮,猎枪吗?或许都是,又或许都不是。它更像一种印记,刻在这块土地上,也刻在生活在这里的人心里。是母亲哄孩子时说的“别怕,咱这儿是中国地”,是汉子们擦枪时眼里的光,是老人临终前指着山岭说的“守住它”。这印记,让每一粒泥土都带着韧性,让每一块石头都藏着硬气,让这片土地上的人,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,都记得自己是中国人,记得脚下的土地,是生养自己的根。

“中国地”这三个字,不是行政区划的标记,是刻在石头上的宣言,是长在庄稼里的骨气,是藏在千万个普通人心里

的星火。是,这便是“中国地”的意义,它告诉我们,最深厚的力量,永远藏在土地里,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人心中。只要这力量还在,无论风雨多大,这片土地上,总会有不屈的脊梁,总会有不灭的灯火。

“中国地”的意义从不在疆域的大小。它是当周围的村庄燃起烽火时,清风岭的烟囱里依旧升起的炊烟;是当鬼子的刺刀逼近时,老乡们把粮食藏进地窖,把孩子护在身后的决绝;是王老凿们躲在石岩后,看着自己的土地上长出谷子、结出果实,眼里闪着的光。这片土地上,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,只有“俺们的地,俺们自己守”的朴素信念。可正是这信念,像无数条看不见的根,在地下紧紧纠缠,结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,让侵略者的铁蹄怎么也踏不破。

清风岭的石头是有记忆的。

八十多年的风雨冲刷,没能磨平那些深嵌在岩壁上的弹痕。盛夏的阳光斜斜掠过辽西西部

的山脊,将层层叠叠的青石照得发亮,仿佛无数双眼睛在草木间眨动。当地人

说,这是王老凿和他的弟兄们在望着咱们——那些在1931年之后,把这片不足百里的山岭变成“中国地”的硬骨头。

如今烽火早已散尽,清风岭的山水依旧,站在当年的“中国地”上,摸着被岁月磨平的石头,仿佛还能听见那些藏在风里的声音——是锄头刨土

的声响,是土炮轰鸣的余韵,是千万个普通人用生命和信念,在这片土地上写下的答案:所谓家国,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叙事,而是每一个人守住脚下的一寸土地、一缕炊烟、一声乡音。

下山时,遇见几个在采摘山杏的孩子。他们的笑声像银铃一样在山谷里回荡,裤兜里塞满了黄澄澄的果实。其中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,举着颗最大的山杏跑过来,往我手里塞:“叔叔,甜着呢!老师

说,这是英雄们守护过的山结的果子。”

我把山杏放进嘴里,一股清甜的汁水立刻在舌尖蔓延开来,抬头望向暮色中的清风岭,那些沉默的石头仿佛都在微笑。

是啊,这甜,他们终于尝到了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在抗日战争中,由于我的家乡河北省雄县恰处于平、津、保三角地区的中心地带,是从北平、天津出发的多条交通生命线的交会处,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地区驻有重兵,经常对这一地区围攻“扫荡”。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,隶属于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(后改为第十军分区)的雄县抗日武装,就像一把尖刀始终插在敌人的心脏,极大地牵制了日本侵略军。特殊的战略地位,使这一地区成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敌我争夺的焦点,斗争异常激烈、残酷。

我的祖姥爷叫井禄祥,是雄县张岗镇方庄村人。1939年初,八路军第120师派出一批党员干部深入敌后,广泛发动群众,扩大抗日武装。李年增来到了已经完全连成一片的张庄村和方庄村。因为祖姥爷在方庄村有一定的威望,李年增很快找到了祖姥爷。从那时起,祖姥爷就开始了他的敌后抗日工作。

李年增化名赵振玉,对外称是祖姥爷的表弟。

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,几个月后,李年增把他妻子和6岁的女儿小玲接来,一起住进了祖姥爷家。小玲恰巧和我母亲同岁,她们俩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。

作为八路军在张庄村和方庄村的落地地,祖姥爷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。在人到齐之前,是不能点灯的。人到齐了,要用棉被把窗户封严,确保没有光线泄露,才把油灯点上。

4月份,日伪军对大清河北的第五军分区大“扫荡”过后,祖姥爷家开会的次数被迫大幅减少。后来,八路军干的干部来了,需要先对敌敲窗警告,而且只能从后窗跳进来。特别是1941年6月,冈村宁次指挥两万多日伪军,对第十军分区(此时第五军分区已改为第十军分区)进行铁壁合围,梳篦拉网、精细分割、驻屯清剿,修公路、建

炮楼、封锁围墙,实行“点、碉、路、沟、墙”五位一体的“囚笼政策”,妄图以“筑堤挡水、淘水捉鱼”的办法,切断我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。张庄村和方庄村的炮楼就是那时建起来的。华北日军还实施了“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”,普遍推行保甲制,以加强和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。

一天,一个姓严的伪军小队队长带着3个伪军找到祖姥爷,提出让他当保长。当时,祖姥爷的态度很坚决,不愿当“狗汉奸”,但趁伪军不注意,李年增却暗示祖姥爷不要拒绝。祖姥爷领会了李年增的意图,就答应姓严的伪军小队队长再想想。伪军们走后,李年增耐心地劝说祖姥爷,保长的身份对抗日有好处,祖姥爷便服从抗日的需要答应下来,这为八路军在张庄和方庄的联络点,也增加了一层伪装。

1942年,5万多日伪军对冀中地区进行“五一一大扫荡”,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,企图一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。5月末的一

天晚上,李年增获得一份情报,得知有300多个日伪军并未撤走,而是停驻在开口村,可能转天要对第十军分区杀一个回马枪。情况紧急,李年增想亲自前往第十军分区驻地小芦管村汇报情况。当时,从方庄到小芦管,不走岔岗,就得走段岗,而在这两个大庄,敌人封锁得很严。祖姥爷对李年增说:“你路不熟,也不是本地口音,又是大晚上,要是碰上鬼子或‘白胖’(当地老百姓对伪军的称呼)盘查,暴露了怎么办?”那天下午,正巧方庄村有个老人去世,老人的一个闺女嫁到了大芦管村,与军分区所在的小芦管村相距不到一里地。在祖姥爷的一再坚持下,夜送情报的任务落到了我

让一粒粮食落到敌人手里。

进入1945年,冀中地区的抗日形势已经越来越好。为了让岔岗至孤庄头公路以来的根据地连成一片,按照上级指示,李年增开始着手拔除张庄据点的工作。5月初,第十军分区派一名叫李金江的干部来到方庄村,配合李年增工作。为了减少损失,李年增、李金江和祖姥爷反复商量,最终决定用土工作业加上引水淤土的方法毁掉炮楼。因为炮楼东侧正对的是一条街道,炮楼朝东倒塌就不会砸到民房。他们组织劳力,先从炮楼北侧一家堡垒户的南院墙开始挖掘地道,先向东挖,挖到距炮楼七八米的位置时,再向南挖,挖到从东正对炮楼的位置时,再向西挖。为了避免被伪军察觉

挖到接近炮楼时,就需要祖姥爷把伪军从炮楼里引出来。那时的伪军,先前的嚣张气焰早已不在,甚至已经开始有些惶恐不安,祖姥爷请他们到炮楼南面的一个院子里吃饭、喝酒,他们也不敢轻易拒绝。地道白天停工,晚上把伪军引出炮楼再进挖掘作业,从炮楼挖到炮楼下方后,就开始引水淤土。5月6日凌晨,不少张庄和

方庄的老百姓都听到了轰隆一声巨响。转天一早,十几个伪军和七八个受伤的伪军退往岔岗,另有四个伪军被砸死。就这样,不费一枪一弹,张庄、方庄的据点便被拔掉了。

1945年5月底,李年增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祖姥爷家,投奔了部队。

1945年6月初的一天,第十军分区除奸科的司季康带领三名同志来到祖姥爷家。

他们一进院门,祖姥爷就迎出来。司季康问:“井保长在家吗?”祖姥爷察觉到这几个人找祖姥爷并非出于善意,就赶紧说:“不巧,刚出去。”这时姥爷也从屋里出来了。祖姥爷就大声说:“快进屋待着。”姥爷把另外三位同志让进了北屋(祖姥爷和祖姥爷的屋子),又出来让司季康时,他摆手说:“车子有点毛病,我得修修。”姥爷说:“先进屋,一会儿我给你看看。”之后连拉带拽地把司季康也让进了北屋。当时,祖姥爷恰巧在我姥爷的屋里哄我妈玩儿。祖姥爷从院子里抱来一大堆柴火,“啪”的一声扔在了我姥爷那间屋子的门口,要给客人点火烧水。祖姥爷故意“咔嚓咔嚓”地把搬柴火的动静弄得特别大,祖姥爷明白了祖姥爷的意思,鞋都没穿就翻窗跑了。如果不是警惕性高,秘密做抗日工作的“井保长”就被“除奸”了。后来祖姥爷向组织报告了情况,除奸队的同志便再也没有来过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,组织上曾经两次找到祖姥爷,说可以安排他到张岗镇上工作,祖姥爷都以自己文化水平低为由推辞了,一直在张庄村务农,直到1975年11月安然辞世。

能够了解到祖姥爷的这些抗日故事,除了妈妈和姥爷零散的口述,还要特别感谢姥爷的堂弟井凤桐,就是我二姥爷。已届鲐背之年的二姥爷,曾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过岔岗镇的党委副书记,时至今日,他仍然思路清晰,表达清楚,记忆力尤其惊人。他所讲的时间和事件,在我查阅《雄县志》等历史资料时,皆找到了出处,真是太难得、太幸运了!

又拌了俩凉菜。

“妈,吃完饭,咱俩下盘跳棋。”“行啊!”母女俩一方下战书,一方欣然应战,我则在一旁观战。

“猜布锤——”最终老太太大锤子胜了小剪刀,取得先手。一看她们就是老对手了,开局后没有过多试探,边角起手、蛇形布局、落子如飞,几步就拉开了阵势。进入到短兵相接、扭扭缠缠阶段,比赛节奏猛地降速,双方一会儿屏气凝神、托腮沉思,一会儿瞻前顾后、举棋不定……

短暂的沉寂过后,混乱的战局已解,突然行云流水起来。只见老太太声东击西、避实就虚,连跳四子、五子、六子,连连使出迂回战术。张姐这边苦苦寻找战机。这一局,老太太抢先一步棋子全部归营。“妈,您先走的。”张姐一点儿也不谦让,娘儿俩打成平手。

“老郑,你和我妈下一盘儿。”张姐见我在一旁摩拳擦掌,接下来让我上。八十八岁,这可是我平生遇到的年龄最大的棋手,出于对老人的尊重和对棋艺的折服,我打起精神全力以赴。

开局不久,我便连连陷入“圈套”,眼神儿还不如老太太好使,只见老人家手指捏着棋子犹如小燕飞一般,一整就是一串“糖葫芦”,逼得我顾此失彼、晕头转向。第一盘勉强打成平手,第二盘中途投子认输,最后一盘我和老人再次握手言和。棋盘上归于平静,棋格像是一个个驿站连起一条水路,双方的棋子全部从这家搬到了那家。

晚上九点多,我起身告辞,临走前还和老人约好下次接着比试。

下跳棋

郑建伟



偷袭的杀招。张姐这边苦苦寻找战机。这一局,老太太抢先一步棋子全部归营。“妈,您先走的。”张姐一点儿也不谦让,娘儿俩打成平手。

“老郑,你和我妈下一盘儿。”张姐见我在一旁摩拳擦掌,接下来让我上。八十八岁,这可是我平生遇到的年龄最大的棋手,出于对老人的尊重和对棋艺的折服,我打起精神全力以赴。

开局不久,我便连连陷入“圈套”,眼神儿还不如老太太好使,只见老人家手指捏着棋子犹如小燕飞一般,一整就是一串“糖葫芦”,逼得我顾此失彼、晕头转向。第一盘勉强打成平手,第二盘中途投子认输,最后一盘我和老人再次握手言和。棋盘上归于平静,棋格像是一个个驿站连起一条水路,双方的棋子全部从这家搬到了那家。

晚上九点多,我起身告辞,临走前还和老人约好下次接着比试。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四期

抗战作品专版

我的老家处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,村外除了树木和干涸的小河沟,与山清水秀无缘。著名的太行山在西面100多里,据大人们说,在天气晴朗夕阳西下的时候,可以看到太行山的影子,可我从小视力不好,在上大学之前就没有见过山。

别说是山,就连小石子也不容易见到。

我家的东邻小货大伯在生产队负责犁地,偶尔会在土里捡到一两枚小石子,黑黑的,圆圆的,很光滑,他放到衣袋里,晚上就送给我和二哥,说那是“老鸱枕头”。我们半信半疑,但也觉得很难得,这些小石子也就成了我们的玩具。

正因为物以稀为贵,我对石头就有了一种天生的喜爱。

大学期间第一次去女友家,下车之后,迎面而来的竟然就是太行山,山上的树木、裸露的岩石,仿佛近在咫尺,我异常兴奋,恨不得直接到山上看看。女友告诉我,太行山还远着呢,得有20多里。到了女友村里,看到那里人家盖房都用石板,石块做地基,不像我们平原上用砖头,时间一长,地基就会盐碱化,危及房子的安全。更为奇特的是,这里的家家户户都堆着不少石头,大小、大小、形状不一、颜色各异,我大开眼界,每到一处,就捡上几块小石头装进口袋。

有了和石头的近距离接触,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,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总要捡几块石头回来。没想到,竟然有了奇特的收获。

有一年去云南丽江,在玉龙雪山脚下,我在一处草坪上捡到了一块黑色的有棱角的石头,乍看上去,轮廓就像是一头牦牛、头、尾、腿、脊背都很像。听导游说,这里原来长满了红豆杉,由于掉下来一块大陨石,使得这里成了一片草坪,再无树木生长,因此我甚至怀疑这块石头就是陨石的碎块。

这块石头,我一直放在办公桌上,有时也拿它当镇纸。

也是在云南的一个景点,我捡到了一块片状的酱红色的石头,细细观察,石头上竟然有一圈圈的年轮,恰似树木的化石,特别是将它泡在水里的时候,年轮就更加清晰。可惜我对地质学一窍不通,否则可以做一番考证。

在山东的泰山、湖南的衡山、河南的嵩山、山西的五台山、甘肃的鸣沙山、大连的老虎滩、

捡石头

刘运峰



洛阳的龙门石窟、呼和浩特郊外的昭君墓、延安的河滩、玉门关的戈壁滩,我都捡过石头。在泰山经石峪,我观看了刻在石坪上的大字《金刚经》之后,捡了两块造型感很强的石头,来到山脚,看到有一家专门为石头制作底座的商铺,于是花了30元钱,给两块石头各配了一个底座。其中的一块就放在我办公室的书柜里,不少朋友见了,还以为是什么身价不凡的宝贝。

2012年秋,我去四川乐山参加郭沫若诞辰120周年研讨会,所住的酒店就在大渡河边。会议间隙,我和龚明德教授来到河滩上聊天,在浅水中捡到了一块黑色的鹅卵石,石面很光滑,仿佛涂了一层蜡。最为奇特的是它的形状,如同一只芒果,稍大的一头中间有一条白线,又像是一头幼牛抹着鲸鱼的嘴巴。我便将它带回去留念作纪念,说不定幼年的郭沫若就踩过这块石头。

在国内捡了不少石头,到国外也同样有收获。

2001年秋冬时节,我随一个代表团去俄罗斯和波兰考察。一天早晨,在圣彼得堡涅瓦河边散步,我捡到了一块黑白相间的石头,正拿在手里摩挲,那位陪同的俄罗斯官员也出来散步,

我不懂俄文,他不懂中文,只能挥手点头算作彼此问候。我把刚刚捡到的石头拿给他看,他仔细端详了一会儿,微笑着发出“赫鲁晓夫”的声音,我听明白了,笑着表示同意他的“结论”。因为,就在前一天,他陪我们参观了莫斯科郊外的新圣母公墓,这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名人墓园,其中就有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墓地,墓碑是一尊用黑白两色石头雕砌而成的赫鲁晓夫头像,我当时便记下了他名字的俄语发音。

在普希金生活过的皇村,在波兰的克拉科夫,我也捡过几块石头,只不过印象已经不深了。

2004年,我有一个公派去英国研修五个月的机会。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哈德良长城遗址上,我捡过深褐色的石块;在爱丁堡,我捡过那里的鹅卵石;在利物浦,我捡过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路基上的碎石块。回到公寓,我把这些石头擦洗干净,放到书桌或多用架上,有时还请他人来欣赏。

回国的时候,由于行李超重,不得不把这些石头丢弃在公寓前的草坪上。但其中的一块我舍不得扔掉,而是把它带回了国内。凡事讲究缘分,捡石头也不例外。那是英国之行的最后一站,晚上,我们在伦敦安顿下来,便和同伴们沿着泰晤士河散步,河边有许多梧桐树,为了防止水土流失,每棵树下都铺着一些石子,类似常见的鹅卵石。我一边欣赏河边的夜景,一边留心着脚下的石头,突然,我发现一块石头很别致,赶紧捡了起来。这块石头颇像一只蛤蟆,深灰色的脊背,白色的肚子,头部还有两个小洞,恰似两只眼睛,我拿给同伴们看,大家都说太像了。而只,二十多年过去后,这块不远万里背回来的蛤蟆石,还放在卧室里的书柜里。

大自然真是奇妙无比,绝没有两块同样的石头;大自然也真是鬼斧神工,赋予石头千姿百态的形状,给人们留下了无边的想象和美好的回忆。

2025年8月23日 范孙楼